

唐宋八大家骈文研究

绪 论

—

说起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唐宋八大家”，人们一般将他们与散体古文联系起来，想起许多脍炙人口的古文篇章。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也符合文学史和八大家创作的部分实际。不过，重视和强调他们的古文创作实绩与古文大家地位，也不能不同时注意到，骈文作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他们在古文创作中大量吸收、融合了对偶、声韵等骈文创作的技巧和方法，另一方面，骈文也是他们创作中客观存在的独立文体类型。

本书主要以唐宋八大家作为独立文体类型的骈文作品为研究对象。它们无论是在数量、质量还是在骈文史的地位与作用上，无论是在个体的创作特色还是在八家整体的成就与影响上，都体现出不容忽视的价值。

唐宋古文运动以后，骈文的一统局面被打破，原来一般采用骈体的文体转而采用散体古文，但就是在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唐宋八大家的著作里，骈文也依然分布在制诰、表、状、诸子、赋、启、书、论、序（包括书序、赠序）、杂记、墓志、祭文、上梁文、颂、赞、箴、铭、解、问答等多种文体类别之中。即以“文起八

代之衰”、一般印象里排斥骈文最力的韩愈为例,检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属于骈体的就有制、赋、解、箴、书、序、祭文、表、状等文体。包世臣《复李迈堂书》说:“周、秦文体未备,……魏、晋以后渐备,至唐、宋乃全。”(《艺舟双楫·论文》卷三)范文澜说:“两宋以下至语体文流行的一千年间,各种文体的渊源,应该是唐朝。”^①包世臣顺流而下,范文澜逆流而溯,都指出唐宋在文体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八大家作为时代的代表性作家,他们的各类骈体创作,也占有着文体史的一席之地。当然,从总体上说,骈文的适用范围在逐步向制、状、表、启等文体收缩,但骈文在特定文体的范围之内可以覆盖得更彻底,如《四库全书总目》说:“自六代以来,笺启即多骈偶。然其时文体皆然,非以是别为一格也。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②也可以区分得更精细,如据中华书局今版《苏轼文集》的文体分类,在苏轼所撰“内制”这一种文体之下,又进一步划出内制赦文、内制诏敕、内制敕书、内制口宣、内制批答、内制国书、内制青词、内制朱表、内制疏文、内制斋文、内制祝文、内制祭文、内制导引歌词,以及乐语等细分的次级文体。^③这些骈文文体分布与细分的事实都表明,八家的古文成就并没有以排斥骈文为代价。

在八家别集里,骈文也在数量上占有着相当的比重。如在350篇左右的韩文中,骈文亦在35篇左右,占十分之一。柳宗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58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集部别集类一六《四六标准》提要,中华书局,2003年,第1396页。

③ 另参欧阳修《内制集》、苏辙《栾城集》“北门书诏”。

元早年参与“永贞革新”，负责撰写“诏诰制命”，但这部分文字因为革新失败而失传。^①而据中华书局今版《柳宗元集》，在69篇“碑志”中骈体至少7篇，占十分之一；在除《永州八记》以外的17篇亭池山水记中骈体6篇，占三分之一；在30篇祭文中骈体12篇，占五分之二。柳集中尚有纯粹骈体的启2卷、表2卷、奏状1卷，合5卷，在除碑志、杂记、祭文以外的34卷柳文中占七分之一。此外，在书、序、铭等之中也有部分骈体作品。

在中华书局今版《欧阳修全集》中，计有《外制集》3卷，制敕165篇；《内制集》8卷，青词、口宣、斋文、祝文、诏敕、制、表、批答、册文、密词、帖子词、上梁文、祭文等405篇；《表奏书启四六集》7卷，表状诸子、书、启241篇。加上《居士集》卷十九诏册6篇，《居士外集》卷九近体赋11篇、卷二十一策问5篇、试策8篇，以上合21卷，在143卷欧文中约占百分之十五。^②此外，在《居士集》、《居士外集》中另有骈体祭文和文赋若干篇。

《苏轼文集》卷二十三、二十四为表状，合130篇；卷三十八、三十九为制敕，合204篇；卷四十至卷四十五为内制；卷四十六、四十七为启，合108篇。以上共计12卷，在73卷苏文中占六分之一。其他尚有非“内制”的青词、疏文、祝文、祭文，以及不少分散在赋、论、叙（序）、记、书、策问、奏议、诸子、颂、赞、铭等文体之

① 孙昌武《柳宗元传论》，第126页。另：本书所引资料，凡在书末参考文献列出者，皆只注卷数或页码，不注出版社、出版日期等。

② 在欧阳修《外制集》、《内制集》之中，部分作品并非骈体。即使在以“四六”名集的《表奏书启四六集》7卷文字中，部分状、诸子、书等亦非“四六”。由于作品较多，有些作品骈散兼行难以准确归类，正如在“古文”作品占多数的它卷中也间有骈体或骈散兼行的作品一样，故在此仅统计制词、表启的卷数，以略窥其在文集里所占的比重。以下各家同。

中的骈体作品。^①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王文公文集》为底本的点校本《王安石全集》，第九至第十四卷为宣诏、制诰，第十五至第二十一卷为表，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卷为启。以上合 16 卷，在 55 卷荆公文中占近三分之一。此外，第三十三卷杂著中的上梁文，第八十一、八十二卷的部分祭文亦为骈体。在中华书局今版《曾巩集》中，卷二十至卷二十六为制诰（卷二十六部分为诏、策），卷二十七、二十八为表，卷三十三至三十五为奏状，卷三十六、三十七为启（状）。以上合 14 卷，在 42 卷南丰文中占三分之一。另卷三十八至卷四十一部分祭文、疏、哀辞，集外文与辑佚作品中的部分表、启、疏、祭文，亦作骈体。在中华书局今版《苏辙集》中，《栾城集》卷二十六祭文、祝文、青辞等 36 篇，卷二十七至卷三十二“西掖告词”342 篇，卷三十三、卷三十四“北门书诏”（包括麻制、诏敕、批答、书、祝文、青词、朱表、表）134 篇，卷四十七至卷四十九贺表、谢表、代人上表、奏状诸子等 72 篇，卷五十贺启、代人启 30 篇。以上合 13 卷，在 34 卷《栾城集》所收文中占三分之一强，尚未计卷十七赋、卷十八辞中的部分骈体作品。在 24 卷的《栾城后集》中，亦有卷十七、卷十八表、记、状、疏、诸子等 2 卷。苏洵在八大家中较为特殊，由于不满少作，他“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亦未有人仕掌制的经历，所以现存骈文最少。但即便如此，现《嘉集》仍存有《谢相府启》、《贺欧阳枢密启》等骈文作品 2 篇。

从以上文体、文本基础已可见研究八家骈文的可能性。而

① 明代以后出于科举需要还将苏轼的一些骈文结集，如《东坡四六》、《苏文忠公表启》、《苏长公表启》等。

更为重要的是,八家骈文还有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明代陆符为王志坚《四六法海》作序,开篇即写道:“先秦两汉之文,至六朝而一变;六朝骈偶之作,至韩、柳而再变。一变而秦汉之体更,再变而秦汉之法出。故唐以后称大家者,无不以韩、柳为宗。”这里的“至韩、柳而再变”、“以韩、柳为宗”一般理解为韩、柳带来的古文之变。但接下来陆符又说,欧、苏、曾、王等的“四六制作”“无不足谢六代之华,而启一时之秀焉。”“盖四六之学盛于六朝,而其法亦尽于诸大家。”(《四六法海》卷首)则无疑讲的是韩柳欧苏的骈文之变。显然,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理解“六朝骈偶之作,至韩、柳而再变”之“变”其实包括了古文和骈文两方面的变化。八家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不仅没有以排斥骈文为代价,而且这些古文方面探索、创新的成果还反哺于骈文,成为推动骈文文体革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大体而言,相对于中古骈文,八家骈文代表着一种范式的转换,即陆符所谓“谢六代之华”,而着眼于它们所横跨的唐宋时代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它们则开创和形成了新的骈体范式,即陆符所谓“启一时之秀”。这也意味着八家骈文可以而且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首先,在韩柳与宋六家之间存在着骈文创作的传承影响。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为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如且放教退之独步。’”^①王志坚评柳宗元《为王京兆贺雨表》:“神理肤泽,色色精工,不惟唐人技俩,至此而极,即欧、王一脉,亦隐隐逗漏一斑矣。”(《四六法海》卷三)方苞评韩愈《为

^① 《苏轼文集》卷六十六,第2057页。

韦相公让官表》：“北宋人四六祖此，但加工致耳。”评韩愈《为裴相公让官表》：“荆公尤近此；欧苏则加藻饰，而音节亦较铿锵。”又评韩愈《为宰相贺雪表》：“荆公苦效此体。”^①储欣评欧阳修《谢宣召入翰林表》：“公四六大较亦自韩出，而加以清丽。”^②这些看法虽然简略，但都从具体作品出发，指出韩柳与宋六家之间的骈文渊源以及不同于前代的共性特点。其次，八家骈文也受到不少推崇，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对于韩柳，朱熹说：“退之《除崔群侍郎制》最好，但只有此制，别更无，不知如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言外殊感可惜；储欣评韩愈《贺雨表》：“明太祖洪武五年，诏禁四六浮词，命择唐、宋表笺可法者。以公此表及柳河东《为柳公绰谢表》为式。”对于欧苏王曾，王应麟指出：“前辈制词如张乐全、王荆公、歧公、元厚之、东坡、颍滨、曾曲阜、王初寮、汪龙溪、綦北海、周益公所作，哀集熟读则下笔自中程度矣。”“前辈表章如夏英公、宋景文、王荆公、欧阳公、曾曲阜、二苏、王初寮、汪龙溪、綦北海、孙鸿庆诸公之文，皆须熟诵。”（《辞学指南》）这些看法虽从教授举业出发，但也从一个侧面见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曲阜）、苏轼、苏辙（颍滨）等制词、表章在当时受推崇的程度。此外，杨道《云庄四六馀话》说：“近时汪浮溪、周益公诸人类荆公，孙仲益、杨诚斋等人类东坡。”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二说：“水心见窗四六数篇，如《代谢希孟上贤相》之类，深叹赏之。盖理趣深而光焰长，以文人之华藻，立儒者之典型，合欧、苏、王为一家者也。”袁桷《答高元十问》说：“汪彦章则游乎苏、王之间。”（《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二）这些看法虽不

① 方苞之评，分别参见《韩昌黎文集校注》第596页、第600页、第598页。

②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六一居士全集录》卷五“表”。

尽一致,甚且相互抵触,但都把欧王苏等视作所谓宋四六的开山之祖,成为一些宋四六的著名作家如汪藻、孙觌、周必大、杨万里、陈耆卿(窗)等之所从出的源头。

以上两方面足以说明八家骈文所取得的整体成就与骈文史地位。这是八家骈文本身的价值。此外,在唐宋八大家的整体创作中,骈文还与古文、诗、词等其他文体构成十分复杂的互动关系,共同折射着创作主体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观念,政治主张和情感、心理。同时,唐宋时代不仅是古文、骈文发生转折、变化的重要阶段,它也是其它各类文体如诗、词、传奇小说等同样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些文体共同创造着、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总体文学氛围和文学风尚。

二

唐宋八大家骈文是一个颇具学术意义与价值的研究领域。不过,对于八家骈文虽然自古及今不乏有见地的看法,但从总体上说,它们长期以来又的确遭到许多忽视、误解甚至排斥。要真正拓展这一研究的空间,揭示这一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也面临着相当困难。这一方面牵涉到新文学运动以来关于唐宋八大家(骈文)研究的一般现状,另一方面也牵涉到古代文学史上长期形成与传承下来的一些观念与偏见。本节与下一节拟对这两方面分而述之。本节首先对一些传统观念与偏见稍作清理,简要归纳以下五点:

一是古文经典形成过程中的“轻骈、拒骈”现象。从四家、六家、七家、八家、十家等的不同宗奉最终确认为唐宋八大家,这经历了一个典型的经典形成的复杂过程。如《唐宋八大家文钞》在

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编选者茅坤阐述其选文宗旨:“至于(柳子厚)墓志碑碣,其为御史及礼部员外时所作,多遗六朝之体,予不录。”(《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而如果不拘泥于四家或八家的具体人选,从古文经典形成的角度看,那么从《唐文粹》起,“文赋惟取古体,四六之文不录”(《四库全书总目》),这个过程已经开始。经过宋、明的长期发展,至于桐城派更趋激烈。方苞说:“古文中忌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①甚至从语体上为古文和骈文划清界限。这当然在具体实践中并不可行,违反几乎是必然的,而一旦违反就又斥之为“非体”。^②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也很能说明问题,明清时代的古文(批评)家在碰到难以处理的唐宋古文家的骈体之作时,往往归之于其“少作”,前引茅坤所谓柳宗元骈体碑志乃“御史及礼部员外时所作”,即隐含着不成熟的微意。侯方域、梅曾亮、陈衍等人也都每每对自己少年骈体的“轻薄”经历表示追悔,陈衍更断言:“凡擅骈文者,其诗、古文皆不工”。^③文体的先后不同选择被看作是一个人从少年的少不更事走向成熟的成长经历。

轻骈、拒骈的极端是把所有骈文都斥之为“选学妖孽”。当然,在古文经典化的过程之中也出现了一些为骈文张目的不同声音,如清代阮元、近代刘师培等人所谓“文言(骈文)正宗”论,但又不免矫枉过正。

二是骈文“正宗/别调”论。以“辨体”著称的中国古代文体

① 沈廷芳《隐拙轩文钞》卷四《方望溪先生传》附《自记》。

② 如钱钟书引陈衍语:“散文中杂以骈语,如阳湖派所为亦非体。”《石语》,第43页。

③ 钱钟书《石语》,第31页。

论十分注重对文体在发展过程中的源流正变的甄别和把握,这种观念在骈文的文体论述中也有体现。虽然人们对于六朝骈体的绮靡多有指责,但说起骈文,又总是将六朝时期奉为“正则”,接下来的“唐体”、“宋调”则是所谓“变体”或“别调”,明代自郅以下不足论,清代的骈体繁盛被视为再度“复兴”。在这样的骈体观念下,看待唐、宋骈文的文体地位和价值的眼光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和限制。如汪琬对陈维崧骈文的赞语就颇值得玩味:“唐以前不敢知,自开宝后七百年,无此等作矣。”^①大有将陈维崧《骈体文集》十卷直接唐前、凌驾宋太祖开宝年代以后七百年骈文之上的意味。李兆洛以《骈体文钞》与古文家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争地步,却也只选隋代、六朝以前的骈文作品。

三是对于“时文”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含混认识。古文运动作为贯穿唐宋两个时代的重要思想文化现象,韩柳欧苏等作为这一运动的杰出代表,他们往往需要有破有立,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但是长期以来,在文学上,对于这一运动与其革新对象之间,却存在着一种简单的画等号现象:以古文革新时文,而时文则是骈文,古文与时文、骈文相对立。这当然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所谓“时文”,其实也具有着比较复杂的内涵,唐宋八大家所矫的时文既有当时流行的骈文(包括科举诗赋),也有一般庸常无奇的散体文,用来矫时文的则既有作为古文运动之成果的古文,也有不甚声张的骈体革新之后的骈文。

四是狭隘的文体本位观念。古文、骈文的文体分别在理论上可能不难,但在具体实践中如何恰当处理却并不容易,往往出现一些左支右绌的被动现象。对比一下古文家姚鼐的《古文辞

^① 许逸民选注《古代骈文精华》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99页。

类纂》和骈文家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就十分有趣,唐宋八大家的不少作品跨选本出现。在姚鼐,是站在古文的本位上“纳骈于古”,在李兆洛,则是以“纳古于骈”实践他“骈散不拘”的骈文理论。

创作实践总是突破一些本位的观念成见,也常常是一些现成的理论框架和理论见解所容纳和解释不了的,唐宋八大家的骈文也不例外。这些作品作为古文、骈文文体互动的丰富成果,是对传统的文体本位观念的挑战,是简单的“纳骈于古”和“纳古于骈”的被动应付无法深入处理的课题。虽然这些本位观念与轻骈、拒骈现象相比,已经体现出更多的弹性和包容,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同样可能成为观念解放、研究创新的束缚。

五是对唐宋八大家十分丰富的理论、实践各执一偏,各堕一边,作简单的对立或片面的理解。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不因循,自树立”、“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欧阳修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又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这些都是引起争议的说法。他们的思想极其复杂,充满张力,赞成者可以引述其他相似的更多的理论和具体创作来支持,不同意见者也可以举出相反的理论 with 创作实践的例子来辩驳。如此将个别论点与整体思想脱离、将个别创作篇目与整体创作实践脱离、将理论与实践脱离,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唐宋八大家的全面理解,其骈文理论和创作更是首当其冲。

因此,对八家骈文的研究,首先需要对有关文学观念、研究观念正本清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拥有着超过具体研究对象本身的学术意义。

三

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古代文学领域,骈文研究一向较为单薄。本节对有关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总结将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等两个阶段。^①在这两个时期,虽然对唐宋八大家骈文的整体研究一直阙如,但一些著作或文章在各自不同的语境里也涉及到八家中的一些作家及其骈文作品。

经过分析、对比可以发现,这两个时期的骈文研究有不少共同特点。首先是“史”和“概论”居多。在“史”的方面,民国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吕思勉《宋代文学》、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在“概论”方面,则有谢无量《骈文指南》、刘麟生《骈文学》、瞿兑之《骈文概论》、金縯香《骈文概论》、钱基博《骈文通义》、以及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等。这些著作大多篇幅不大,重在概要性的线索描述,辅以一两篇或一些骈文警句、警联支持论点。虽然简略,但它们往往能从大处着眼,免于陷入细节和材料的堆砌之中。对于唐宋八大家也详略不同地

① 上世纪50年代以后、80年代以前骈文研究更是整体萧条。在此状况之下,值得一提的相关成果有: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在60年代整理标点重印,其下册其实是唐宋骈文,内选注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的骈文数篇,注解与评点都十分详细和精当;章士钊由于其特殊身份,所撰《柳文指要》在70年代出版,虽不免带有时代的印记,但作者积毕生精力的研究成果亦间有发明。此外,这一时期特别是60—70年代,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柳宗元、王安石作品如《柳河东集》、《王文公文集》,相关资料如沈钦韩《王荆公诗文沈氏注》、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等大量出版,对于今天的研究依然具有较重要的客观文献价值。

有所论列,其中欧阳修、苏轼论述最多,间论柳宗元、王安石,韩愈、曾巩、苏辙涉而不论,苏洵几不提及。有关论述可以从三个方面总结如下:

第一,八家在骈文整体流变中的地位和特色。如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第六章“唐代骈文概观”：“韩柳为古文运动之开山祖，而皆擅骈文。柳子厚尤为一大家”，第八章“宋四六及其影响”：“宋四六之散文化，实以欧阳修为开山祖”；“欧公之体，王安石、曾巩、刘敞、苏轼、苏辙，无不效之；而曲折变化，以东坡为极尽能事。”在《骈文学》“宋代作家”一章，刘麟生更指出欧苏一派“实自陆宣公来，谓之变体可，谓之不及六朝亦可，若谓之不及三唐，恐亦未必然也”。吕思勉《宋代文学》第三章“宋代之骈文”也指出“变自欧苏”的宋代骈文的特点：“以宋代之骈文，与宋代之古文较，则为骈文；以宋代之骈文，与唐代之骈文较，则唐代之骈文，可谓骈文中之骈文；而宋代之骈文，可谓骈文中之散文矣。”大同小异的观点在钱基博《骈文通义》、谢无量《骈文指南》、瞿兑之《骈文概论》中也可见到。钱基博认为欧苏“皆以气行”；谢无量也认为，以欧阳修为代表，曾巩、王安石、苏轼师法之的四六变体，以“古文气格行之”；瞿兑之《骈文概论》则指出这种“新的文体”，是“白描的骈文”，即“是不用典的骈文，是以古文作法来作的骈文”。

这些见解既和传统看法一脉相承，又有新的发展。但都对韩柳的地位缺乏更深刻的认知，对欧苏等骈文的地位与特色说法虽有不同，但都归结为“散文化”这一主要特色。

第二，具体作家、作品的风格。如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评柳宗元《南府君霁云庙碑》、《张公舟墓志铭》“笔力横恣，徐庾之所未逮者”。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则认为韩愈对柳宗元“雄深雅

健”的赞赏，“移论骈文，此言亦切”。又认为“东坡迁谪诸表，泪随声下……其情感真挚，措辞优越，得未曾有”。

第三，进行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尝试。如蒋伯潜父子的《骈文与散文》列出专门章节讨论骈文与散文的异同。刘麟生《骈文学》第一章把骈文与西方的“平行语气 Parallel Contraction”相比较，并举出莎士比亚、蒲伯、伯克等作品的例子。后来吴兴华、戴儒龄等英语学界研究者和美国著名汉学家浦安迪等也都沿着这一个思路，把骈文、对偶等与西方文学中的同类现象进行了更详尽、有趣的比较研究。

新时期的骈文研究，在“史”的方面，则有姜书阁《骈文史论》，郭预衡《中国散文史》，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于景祥《唐宋骈文史》（后作者推出《中国骈文通史》，“唐宋”为其中一段）等。在“概论”（通论）方面，则有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莫道才《骈文通论》、尹恭弘《骈文》等。这些“史”和“概论”也有部分论述与本书研究对象相关。如姜书阁《骈文史论》被认为是建国以来一部有分量的骈文发展史。不过他把唐以后的骈文全看作“衰变”，全书洋洋洒洒五百四十页只花不到一百页匆匆打发。在“唐骈衰变第十三”一章中的第四节“古文家韩愈、柳宗元及其前后的骈文”着重讨论了韩、柳，指出韩柳倡导古文，论者就说他们反对骈文，其实遍读全集，找不到他们直接反对骈文的证据。继而结合韩柳的几篇骈文作品，指出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之说不当，刘熙载“实集八代之成”才是知本探源之论，而“柳之不曾全抛骈体则尤为显然”。“宋骈四六第十四”一章的有关小节是：第一节“宋代四六骈体的衰变”，第三节“欧阳修、苏轼与北宋四六骈文”，第四节“曾巩和王安石的四六骈文”，第六节“王安石创为经义之文及其流弊”。其中，对王安石“经

义”的论述被一些论者认为“可为一家之说，有一定影响”。^① 其实，古人不论，近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对此已早有论述，而且在王安石之外一并讨论了苏辙的经义。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是作者对自己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成果中涉及到中古骈文部分的文章结集。本书共分五个专题十讲，讨论的中心内容是骈体文学的艺术特征及其利弊得失。作者学殖深厚，言必有据，论必有见。由于唐宋八大家骈文正是对中古骈文传统的调整和转向，因此只有首先对中古骈文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理解八家骈文的实际探索。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古文论要义十讲》的每一个真知灼见，都从另一个方向推动和启发对于八家骈文有关问题的深入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的骈文研究出现了将“唐宋”合在一起加以讨论的整体眼光。如尹恭弘《骈文》一书第四章“变异：骈体文实用化的趋势——唐宋时期骈体文演变情况概观”，把唐宋骈文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初唐，以四杰为代表；第二阶段盛唐，以“燕许”为代表；第三阶段中唐，以陆贽为代表；第四阶段晚唐，以李商隐为代表；最后是以欧苏为代表的两宋。但本书没有将韩柳列为讨论对象，对欧苏为代表的骈文特色概括为“疏荡化”。另一个整体讨论唐宋的例子是于景祥《唐宋骈文史》。这是第一部骈文断代史，对唐宋八大家包括历来不被注意的苏洵都有讨论。不过，无论是《骈文》还是《唐宋骈文史》，在具体论述上都失之简略，一方面，没有显示出整体论述应有的格局，对所论作家在所谓骈文“变异”期内的动态互动、传承缺乏总体把握，另一方面，对于具体作家的论述也仅止于“聊举数例”，全面、深

^① 施懿超《宋四六研究略述》，《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

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也许正是“史”和“概论”性著作的通病。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在散文(古文)之“馀论”部分、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每章专节都把骈文作为广义散文的一部分有所讨论。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在“宋四六”的大题目下对欧苏等的论述总结了自古及今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并略有发挥,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民国和新时期与本书相关研究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重视研究的基础文献工作。当然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民国时期古风未曾尽泯,比较重视指导初学者学作骈文,这一类结合具体篇目阐发作法的骈文选本有:王仁溥《评注骈文笔法百篇》、王承治《骈体文作法》、张廷华《新体广注骈体文自修读本》、金敏伦《骈体应用文》、金茂之《四六作法骈文通》等。民国时期重视基础文献的第二个方面是注意对古代骈话和古代笔记、诗话等涉及到的骈文资料加以介绍、出版。如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即单列“评论骈文之著作”一节,骈话如《四六话》、《四六谈麈》、《云庄四六馀话》、《辞学指南》、《宋四六话》等都得到推介。钱基博《骈文通义》也说“谈骈文者,莫备于乌程孙梅松友《四六丛话》。”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里,钱基博又对《四六丛话》和孙德谦《六朝丽指》等称引有加。

新时期对基础文献的重视更是后来居上,主要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继承和发扬民国时期对骈文选本的重视、对骈话等研究资料的推介和整理出版。在选本方面,十几年来相继有黄钧、叶幼明等编《历代骈文选》,谭家健主编《历代骈文名篇注析》,王明洲编《古文与骈文》,许逸民选注《古代骈文精华》,殷海国编

《历代骈文精华》，周振甫编《骈文精粹》，朱洪国编《中国骈文选》，莫道才主编《骈文观止》，赵振铎《骈文精华》等。其中，谭家健主编《历代骈文名篇注析》比较突出，虽带赏析性质，但出自相关名家之手，往往能发人思考。在这些选本中，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的一些名篇入选，虽是单篇孤选，但与历代选文先后相续，倒似乎以更直观的方式体现了唐宋骈文承前启后的特性和地位。

在对骈话等研究资料的推介方面，曾枣庄《宋代四六创作的理论总结——论宋代四六话》、莫道才《论宋代四六话的兴起》、《论〈四六丛话〉的学术价值和骈文思想》、莫山洪《论宋四六话的兴起和骈文理论演进》、陈志扬《〈四六丛话〉：乾嘉骈散之争格局下的骈文研究》等论文具有一定价值。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在“宋四六”部分也较详细地列举了有关文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道才最近推出《骈文研究与历代四六话》一书，除自己的一些研究论文外，内收王 《四六话》、谢 《四六谈麈》、洪迈《容斋四六丛谈》、杨 道《云庄四六馀话》陈维崧《四六金针》、钱基博《骈文通义》、孙德谦《六朝丽指》等著作，以及孙梅《四六丛话》“叙论”、李兆洛《骈体文钞》评语等，堪称迄今最为完备的骈话文献荟萃。此外，民国时期的一些代表性骈文研究论著在新时期也得到重印出版，如刘麟生《中国骈文史》、蒋伯潜父子《骈文与散文》、瞿兑之《骈文概论》等。

第二，经过相关专家、学者和出版单位的共同努力，唐宋八大家的文献整理日趋完善。唐宋八大家都出了点校本，有的更出了校注本、笺注本。如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童第德《韩集校注》、屈守元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集体点校《柳宗元集》，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曾枣庄、